

【文化杂谈】

“大师”如何诞生

□陈平原

今日中国，只要你逛一逛街或开两次会，就能灌进一耳朵的“大师大师短”。这边厢刚见识过几位史学大师、物理学大师、指挥大师，那边厢又来了好些烹饪大师、风水大师、催眠大师；而任何一位穿上袈裟的，也都可能被称为“大师”。至于在各种展厅晃动的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”招贴，更是师出有名——先由轻工业部负责，后有发改委接盘，如今则改为行业协会主持。若你过于天真，想“正本清源”，那是做不到的，因“大师”这概念没有专利，且内涵与外延很模糊，谁都能用，说不上“侵权”。

你若问我何谓“大师”，我先请教评价的范围及尺度。不说滥竽充数的，也不提拉大旗当虎皮的，更不屑于分辨那些花大价钱买来的，就算都是个“人物”，也还有个等级问题。诗人兼批评家艾略特(T.S.Eliot)在《什么是经典作品》中，曾将不受时间与地域限制，永久地为全人类所欣赏的作品，称为绝对的经典；而将那些在特定时代、特定国度受激发的好作品，称为相对的经典。套用这个说法，今人眼中的“大师”，也可以有绝对与相对之分。

在“天不生仲尼，万古长如夜”与“六亿神州尽舜尧”之间，应该有一个比较宽敞、适合于从容地展开论述的空间。拒绝价廉物美的颂词，也不喜欢高不可攀的神坛，我倾向于阅读、阐释那些离我们比较近的“相对的大师”。具体尺度，接近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先生(1936-2012)担任学术顾问的系列电视片《大师》，即选择百年中国在思想、学术、文化、教育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引领风骚、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，作为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。之所以选择“百年中国”的视野，那是因为，晚清以降，中国人在与西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的接触、碰撞、竞争与融合中，逐渐发展出自己的信心与道路。还有就是可操作性——谈论“大师”，标准不宜定得太高或太低。定得太低，满街跑大师，一点神圣感都没有，消解了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；定得太高，立说的只算孔孟，写诗的仅有李杜，则让许多原本奋发有为的青年才俊彻底绝望，那也不是好主意。另外，还得考虑各学科的特殊性。即便是认真、笃实、开明的读书人，受各自学科文化的影响，也都有自己的偏见——坐下来讨论问题时，不仅隔行如隔山，且各有其自信与尊严。我在北大讲现代中国学术史，提及“百年中国”十多位文坛方面的大家，某经济学家看了名单，很不屑地说：这算什么，没有一个哈耶克！因此，本文还得再加一个自我限制——所谈论的，仅限于现代中国的人文学者。

我相信，真正的大师，不是一时一地的政治需要或传媒捧场就能制造出来的。个人潜能——如才思敏捷、学贯中西、博古通今、德才兼备等，并非本文讨论的对象；我想追问的是，在众所周知的“天赋才情”以及“废寝忘食”外，还有什么因素促成了“大师”的诞生。思前想后，斟酌再三，终于逼出了以下三句话：第一，时势造英雄；第二，高徒出名师；第三，伟大也要有人懂。

翻阅人类文明史，时常感叹命运不公，造化弄人——有的时代天才或曰大师成批出现，竞相争奇斗艳，让你应接不暇；有的时代则平静、平淡、平庸得让后世的读者昏昏欲睡，所谓叱咤风云的“大人物”，也都不过尔尔。念及此，倒吸了一口气，并开始盘算起自己生活的时代来。

几年前，我写过《“少年意气”与“家国情怀”——北大学生



巴金

当下中国，可以“寻找大师”，但不该将其作为主攻方向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努力营造好的文化氛围，让一代学人的精神、气质及学问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舒展与发挥。



傅斯年(左)与胡适(右)



前排左起：周建人、许广平、鲁迅；后排左起：孙福熙、林语堂、孙伏园



左起：许若昂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俞平伯

生(1916、1917、1918级)，明显比此前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激情、有机遇、有舞台。依我的观察，各大学各院系大都如此。当初的“同学少年多好事”以及日后的追怀与阐释，成为其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。昔日的口号或学说，早就被后人超越了，但那种追求真理的气势以及青春激情与理想主义，永远值得你我追慕。”这里的“同学少年多好事”，引自俞平伯1979年所撰《“五四”六十周年忆往事》，此诗接下来的一句是：“一班刊物竟成三。”说的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的同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持三种刊物——以“文艺复兴”相号召的《新潮》、主张“昌明中国固

有之学术”的《国故》以及提倡“新旧学说并行、东西文化并重”的《国民》。这三个杂志存在的时间都不长，但在现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；更重要的是，当年参与其事者，日后大都有很好的发挥。翻开《北京大学中文系系友名录》(2010)，这三届学生共79人，一眼就能认出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、罗常培、许德珩、杨振声、俞平伯；1917级的邓康(中夏)、罗庸、任乃讷(二北)、杨亮功、张煦、郑奠、郑天挺；1918级的成平(舍我)、孙福源(伏园)等。排列顺序是系友录给定的，别无深意；至于个别比较生疏的名字，括弧中注出了日后广为人知的字号或号。

四年前，北大中文系举行百年庆典，需要梳理一下系史，当时我就感叹这三届“人才辈出”。事后仔细想想，认可老话所说的“时势造英雄”——不管从政还是治学，那都是一个“关键时刻”。思想潮流、历史机遇、问题意识、研究方法等，都直接指向了政治舞台的更换以及学术范式的革新。身处此临界点，改革障碍小，社会期待高，发展空间大，实在是再幸运不过的了。一代新人，就这么携着风雨雷电“闪亮”登场了。

有那个“时势”，不见得你就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，将自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；但没那个“时势”，你再努力，也都很难有大作为。所谓“风云际会”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一代人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学术深度，有时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。

不是所有“大师”都能在生前得到社会承认并获得表彰的。你说人类文明史上“群星灿烂”，我看到的则是“尸横遍野”——君不闻杜甫诗句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？不说那些具有“大师”潜质而最终未能完成的“千古文章未尽才”，即便做出了伟大的业绩，也有可能不被当世读者认可。人类历史上，多的是被埋没的天才、被误解的先知以及被怠慢的大师；当然，与之相伴的，是无数被拔高的领袖与被夸饰的英雄。如此尴尬局面，似乎更是常态。这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俏皮话：“伟大也要有人懂。”

世人之谈论“大师”，严格意义上说，只是在表彰那些“被认可”的人物。知音难求，彩云易散，倘若你的学问得等五十年乃至两百年后才被发现与尊崇，那么，当下的你，听不到任何掌声，是非常寂寞的。学者与社会的互动，不是越密切越好；做大学问的，往往不太为当下的一般民众所理解。既能准确预见未来，又能拿捏好分寸，让自家功名得以在当世兑现，是一种本事。若做不到这一点，那就学章学诚，“未有不孤行其意，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，举世非之而不顾”(《文史通义·答客问中》)。

当下中国，可以“寻找大师”，但不该将其作为主攻方向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努力营造好的文化氛围，让一代学人的精神、气质及学问都得到比较充分的舒展与发挥。因为，你我生活的时代，到底是天才辈出，还是平庸得只能矮个子里拔高个，眼下说不清，只能留待后人评说。

(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)



悦读·分享

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“青未了”。

不久前，游览巴黎。漫步走在法国总统府前的环形马路上，马路不宽，仅仅是两个车道。车辆虽然很多，但是没有出现拥堵，一切显得有条不紊，秩序井然。走到临近香榭丽舍大街时，看到一家设在路边的餐馆。餐馆小巧雅致，餐厅内有十多张餐桌，但均已有了预订，我们只好在餐厅外面的餐桌落座。这里只能放下两排餐桌，中间是过道，虽然有点拥挤却也舒适。因为正是下班时段，路边人来人往，车去车回，但是没有丝毫嘈杂和混乱。用矮灌木隔离的用餐人和外面的形形色色的路人互不影响，仿佛都没有在意对方的存在。

这样的恬静安宁对我们这些来自拥挤不堪的北京的人

【贤言随语】

让“贤惠”归来兮

□刘志勤

而言，真是久违的梦想。沉醉于巴黎式的宁静中，我们竟然一时忘记点餐。服务员毫无催促之意，每次总是友好地暗示我们是否需要什么帮助。当我们询问哪种红酒最好时，服务员微笑着说：酒的美味首先要和当天的天气及心情相匹配，其次才是和所享用的食物互联。他推荐了一种品牌(在国内从未见到过)让我们品尝，的确纯味爽。

我们周围有十来张餐桌，居然听不见大声喧哗，好像人人都在窃窃私语，恐惊旁人。这样的斯文让我们这些来自热闹国度的客人真有几分不适应、不自在，我们似乎总有点什么憋在心里想爆发出来。但是，看到周围的客人、行人都是那么平静祥和，我们的心境也变得异常安宁。太阳落山了，远处的彩霞渐渐退出天幕，华灯初上，行人依然匆匆，汽车照常川流不息，不远处埃菲尔铁塔的灯光把天空映得绚丽无比。我们一边品着美酒，一边细嚼着美餐，真的希望时间能够暂时停止，哪怕是短短的几分钟。“宁静”或许就是一种修养，是一种德行，而能够享受这种宁静，则需要一种造化。

当我们正陶醉在仙境般的意境中时，我无意中看到旁边餐桌底下正卧着一只老鼠。这个老鼠个头不小，至少半尺长。开始，我以为是只死鼠，细看发现它正在呼呼大睡。我吃了一惊，感到不可思议，下意识地提醒同桌的客人注意脚下。

原以为对方会大喊大叫，惊恐万状，我甚至为这两个女宾打抱不平，如果是在国内餐馆遇到这事，餐馆老板算倒大霉了，一场火药味浓浓的辩论肯定免不了的，至少会和餐馆交涉，先找当班的经理，不行就叫老板来说明白，挖根源：为什么会有老鼠在此？为什么会让老鼠趴在他们的桌下，是不是老板想害死客户？是不是一直用老鼠肉招待客户……不把老板整成老鼠誓不罢休！最不济，这顿美餐不全免单，也得打个半折。如果不同意，就发照片上网，非让你老板“倾家荡产”不可！

我们每个人都心里在设计着各种版本的剧本，猜想事件的发展方向 and 结局。但是，中国式思维在巴黎街头未能成真：同桌的两位女士只是微微一笑，似乎不想让这件事影响了大家的食欲和清静的氛围，仅仅小声地把餐馆的服务员叫到身边，指了指脚下那只酣睡的老鼠，还做了个鬼脸，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服务员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，急忙把餐馆主管急急匆匆请过来。那只老鼠早已溜之大吉，消失在灌木丛中。

我原来认为会有一场“激动演出”的想法泡汤了，这么“大”的事，居然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落幕了。这让看惯这类热闹的我们多少有些失落，因为如果换在其他国家，例如中国，这只老鼠肯定会成为一个“大明星”，用餐人决不会放弃这么一个“大好机会”，肯定会和老板争吵、辩论，经济赔偿、精神赔偿等都会搬到台面上来，而网络也会像被打鸡血一样无比亢奋！可是，在巴黎，在香榭丽舍大街旁，爱丽舍宫旁边的餐馆里，两个漂亮时髦的法国女士，一个肥硕的老鼠，多么好的情节素材，竟然静悄悄地结束了！

“客人失去了一个维权的极好机会”，同行的朋友无不揶揄的话引得大家的会心一笑。巴黎尽管有太多的故事，但是，这个老鼠的故事却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。我们对那两位女士由衷地敬佩和崇敬，被她们的“贤惠”所感动。

“贤惠”曾是国人的传世美德，现在却似乎有些“久别重逢”的感觉。时下有太多的中国人早已经不知“贤惠”为何物，在金钱和利益的驱使下，人们在过度消费祖宗留下的一点点“贤惠”，为了一些微小的事争得头破血流，六亲不认。当人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一些琐碎的“维权”上时，却没有发觉自己也变得琐碎和猥琐不堪了。

文化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德行、一种品位、一种修养、一种尊重的载体。不需要有太多的历史沉淀和知识积累，文化同样能够灿烂，其实只需要一点点的“贤惠”而已。如今的人与人之间似乎被利所困、为益所惑，难得“贤惠”一下。然而，没有了“贤惠”，也就没有了文化，也没有了人情。“贤惠”是文化的灵魂，更是社会的精髓。缺乏“贤惠”的社会，一定是个没有人味的斗兽场！

“贤惠”归来兮！因为当今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“贤惠”的回归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)